
官府、士绅与赌风治理

——以晚清温州为例

王兴文 徐蒙蒙^{*1}

【内容提要】:温州自古民风淳朴、百姓好学乐思,自宋以来素有“东南小邹鲁”的美称。然晚清以降,西方因素的巨大冲击使得温州淳朴向善的邹鲁之风渐趋萎靡,不良之风逐渐蔓延,其中赌风尤盛。本文通过对晚清温州赌博的表现与危害、温州官民禁赌状况进行系统爬梳,阐释晚清官府与地方宗族对乡村治理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建构基层地方官员和宗族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中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展现乡村治理中二元互助的历史记忆图景。

【关键词】:晚清 温州 赌风 乡村治理

在社会史的研究中,赌博是最受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赌博作为起源于古代的一种娱乐游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获取钱财为目的的投机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恶习。身陷赌博之人,轻则输光钱财、倾家荡产、败坏社会风气,重则铤而走险、以致引发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赌博在各时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然就温州而言,晚清以降复杂因素使得其社会风气发生颓变,赌风兴盛,这严重扰乱了地方社会秩序,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晚清温州民间禁赌措施及其实施效果,重建当时温州官绅治理乡村的图景,以期揭示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运行态势。

一、古代温州之淳朴民风

温州自古钟灵毓秀,甲于东南。据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温,古东瓯也。自晋时已立为郡。”^[1]即为永嘉郡。“隋初废郡改县属处州,唐改为东嘉州,后废为县属括州。上元初改为温州,以其地恒燠少寒故名。”^[2]温州之名自此始用。

温州自古已有勤谨向上、崇尚文教的淳朴民风。正如史书所言,自“汉魏以还,天下有变,常首难于西北”,“自晋元帝南渡,东南文物渐盛。而鹿城既建,俗尚一新。”^[3]正是永嘉南渡,北人大量南迁,自此温州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风气为之开新,衣冠锦绣,斯文儒术,繁华富庶,“吟咏不辍,盖亦因颜、谢、徐、庾之风焉”^[4],可以说自晋以来,永嘉“其山川灵气,积古未泄,直蜿蜒于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5],数千年间温州依然风尚犹存。正是魏晋时期的这种文风为以后温州的乐善好学奠定了基础。其有文曰“吾瓯界于海上,聚惟土育,风淳俗良,盖自晋始。”^[6]

有宋一朝,温州更是民殷物富,“崇尚文教。”“号小邹鲁,风流馥响,迄今犹存”。^[7]其中时任温州知府的杨蟠在其诗《咏永嘉》中就把温州比作杭州,其曰“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8]更能显示温州文教昌盛的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流派“永嘉学派”形成于时,形成于斯。毫无疑问,自晋及宋,温州学术昌盛,赢得了淳朴善良、好学敢思的“邹鲁之乡”的美称。以致后人言“宋时儒学如王刘诸公彬彬继起有小邹鲁之称”^[9]即是如此了。

明清以降,整个温州社会更是延续宋元以来的民风,保持着“少争讼,尚歌舞”,“故家大族率重清议,尚礼文建祠崇祀

¹ 作者:王兴文,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蒙蒙,温州大学中国史研究生。(温州 325035)

以联族属”的美俗。呈现出“田肥美，民殷富，其土美秀，而文其俗修洁，其好文近乎儒，其芬华靡丽近乎苏杭，其诵读弦歌近乎邹鲁”^[10]一片勤于耕作、乐善好学的繁华景象。俗语有言“风俗随地而异，亦视上为转移”，温州上有限山阻海的独特环境，下有崇尚文教的乡贤仕宦的引导，数千年来“天性之善”“相习成风，积久不能易也。”^[11]清人郭钟岳在其《瓯江小记》中说“温民勤于稼穡，比他出游惰较少”“地居偏僻，俗风近古，缘民心机变不熟，故未与时变迁。”^[12]以致出现“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紵工，不宜粟麦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13]的景象。

明朝至晚清之前的温州风气更是依然维持着“尚简朴”“风气淳朴”，士农工商各安本分，“风近古矣”的习俗。由此可知，温州风气古今皆大体相同。

二、晚清温州赌风的形成

（一）开埠前后温州社会风气的转变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国正经历了如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形势下，温州的社会生存环境也在发生极具复杂的变化，民风由“不事争斗”逐渐变为“争竞成风”，温州不再只是传统的温州了。

1876年中英在山东烟台签订了屈辱的《烟台条约》，内容之一是增开包括温州在内的四处为通商口岸。从此，温州的大门被打开了。温州就像一个带有水闸的池塘，原本自我净化。开埠就像是把这个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洪流汹涌而来，不管是清水还是浊水都一起涌进来了。瑞安著名士绅项崧说“光绪丁丑（1877），西人以马嘉理一案索开码头、通商舶，天子允其请，于是西人之至者遂多”。西人的到来，使得温州社会秩序开始复杂起来。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如同基督教一样大摇大摆地进入温州，甚至比传教更野蛮，外国的经济势力逐渐、稳步地向温州内地深入，严重冲击了温州传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这使得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社会难以维持，百姓生活艰难，纷纷破产。如此一来，浙南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一步步推动着浙南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浙南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

其实在温州没有开埠、西方商品没能大规模的涌入之前，传教士即商品的伙伴——基督教，并没有停下它进攻的脚步。近代以西方耶稣信仰为信仰宗旨传播方式和思想体系与儒家宗法观念本身的巨大差别在很长一段时期缺乏巧妙融合，以及二者背后所承载的实体代表冲突不断，上至官府、下至普通民众与基督教存在很大的矛盾，以致教案频出，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它巨大的负面效应。毫无疑问，信仰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内在反应，这种信仰的变化或者说信仰的多样化恰恰从侧面反映了温州民风的转变。除了信仰以外，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由此可见近世以来的基督教已经先于商品开始对温州百姓产生巨大的影响，温州的信仰系统乃至风气发生了巨大改变。

简而言之，西方经济的浸入和西方思想的传入造成了温州人民精神的恐慌和生存的艰难，以致温州俗稍浮薄，风气渐漓。同时而言，西人的到来削弱了官府的原本完整的权力，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弱化了。

（二）温州赌风的兴起及其表现

晚清以降，温州复杂的社会环境为由来已久的一种社会陋习——赌博提供了温床，逐渐在温州兴盛并且随之呈现出不断恶化甚至猖獗之势，加之一些地痞无赖之徒乘虚而入，设赌诱骗，以致不管是温州的城市，还是乡村都盛行着赌博之风。这在官府文书和民间碑刻中均有所反映。时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感慨“本邑声明文物，昔有海滨小邹鲁之称，近今民情渐即浇薄，好尚日趋诡异”“而桀黠之徒、奸邪之辈，多方煽诱，一误听从，遂至陷为匪类，又有相沿积习。事出情理之外，执迷不明，辄借口以乡风向来如此”^[14]。甚至就连平阳县的乡村耆老都称“该处百余年来向无赌风，近因有素不安分之人，引诱良善多被其害”^[15]参与赌博而输光家产的赌徒，为了生计，不惜铤而走险，“日间开庄放赌，夜间同伴偷窃”，更有甚者沦为盗贼，犯上作乱，以致最后被捕入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可见温州的赌风一时势头凶猛。

考察赌风必然要从源头进行，如此一来就必须清楚晚清温州存在何种赌博形式。经过梳理得知，晚清温州的赌博花样是极其丰富的，尤其是受西方影响，出现了新的赌博形式，比如花会、彩票、白鸽等等。这几种形式既保留有中国的文化元素，同时也有西方的色彩，对人们更具有诱惑力，其中以花会的诱惑力最强，危害也最大，故而本文以介绍花会为主，兼及其他。

花会，又称为“打花会”。不熟悉者，初次听到花会，以为是举办的花卉展览或者花祭等节庆活动，其实不然。花会最初借助于花祭活动时男女盛饰空前、前呼后拥、彼此往来的混乱场景，场所因大多借助于祠庙进行隐匿活动，加之它是根据古人像下配以牌九牌的挖花图案而来，故而这种赌博形式得名“花会”。关于花会赌的说法和起源传播路径史料记载不一。清《皇朝文献通考》中记载“禁止闽省花会名色。”^[16]“国初，苏州富商大贾、妇女宴会，辄广携白镪，招邀赴会，谓之花赌。沿至于今，犹未改也。”^[17]可见清朝前期已有此说法。又说“花会为赌博的一种，不知何自始。广东、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时多在荒僻人迹之处。而以广东为最盛。”^[18]道光四年韩文绮上书皇帝说“花会赌博皆有首恶者为之倡，而愚民无知，遂致被其引诱，倘能将为首者严办示惩，而被胁被诱之人定可纷纷解散，化莠为良。一面遴委干员改装易服，驰往各处密查，并飭道府明查暗访，如有前项会匪劫掠，及盐梟勾结花会聚赌各情，地方官惮于缉捕，讳匿消弭，及化大为小即据实揭报。”^[19]他说花会赌博必有首恶之人引诱良民，如能严办必能使他们改邪归正。同时匪徒勾结花会聚赌，飭令府、道官员进行缉捕。如此可见道光年间花会在某些地方已经引起了混乱。总之，花会这种赌法起源于何地众说纷纭，有一点大约可知，其最先兴起地在东南沿海一带。清初已经有花会说法，晚清以降逐渐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传播兴盛开来，并在赌徒中间产生一定影响，扰乱社会秩序。以上海为例，“上海，自从成了通商大埠后，一直是个令人迷乱的地方，尤以清末民初，世风浇薄，品类混浊，固为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是个清白纯洁者之陷阱，它随处摆着色情的饵，也到处张着五光十色的赌博的网。”^[20]上海作为较早开放的城市，商业经济较为繁荣。然而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与较为独特的社会环境，也给上海带来了种种丑恶现象，赌博就是一例，其中花会赌博在清末民初更是达到鼎盛。

花会的赌法也是各地不一，但多是大同小异。晚清温州的赌法是设赌者公布三十四个古人姓名来代替三十四门，每位古人对应画一幅主轴并署上名号悬于梁上，以便到开封时公布。由于赌客中有很多文盲，对这34位古人人名和图画很难区别记忆，同时这些赌客又大多为牌九的赌客，所以又在每幅人像的左下角配上一只牌九的挖花图案以便识记，参赌者都以认花牌图案押赌注，如果押中，则赢得数倍于己的赌资，如若失败则赌资全数归于设赌者，因此成为花会赌。

花会场所一般由主方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祠堂和庙宇进行。花会中参与者主要有筒主、航船等角色。其中筒主即是花会组织者，也就是花会场的老板。航船则是花会组织中最重要角色。他们的任务是游说诱骗良家子弟，为赌场招徕赌客，这些人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穿梭于各街巷角落间，唆使良家子弟来参加花会的赌博。因参加花会赌的赌客有的甚至可以亲自到场，把押注的古人名及赌注交给他们，开筒后如果中彩，他们会将赌彩送到赌客手中，因此付得几个“喜钱”。他们的作用就像摇船“摆渡”，故名航船。也因此，航船又称为“跑风”。所以说，赌场的生意全依赖于航船。

参加花会赌人员的主要是中下层百姓，男女皆可参赌，妇女甚至占据多数。故而“一访闻乡间，赌风颇盛，甚至妇女亦有掷骰斗牌，近来恶习，开设花会，尤可痛恨”^[21]的记载。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大都很低，为了赢钱，他们往往求神拜佛。为此，经常发生匪夷所思的以梦求神开示赌博结果、甚至有出入丛冢中，无所不为，且有因而残生者的荒唐做法。这就使得花会赌具有了迷信的色彩。平阳县令汤肇熙在《牒款禁除恶习示》云：

近更有设太平银玉等三十四名为三十四签，总名花会。其为首者，名曰花会司，于地保公差均有私费其例，立一花会神。其又有名收花会引者，人家不惶自送至花会引处，听花会引信息，以知输赢。赢者每一钱偿三十二文，输者男女夜赴社庙呼号妖鬼灵神求胜。再赌不应，则肆行诋毁，甚至有开棺取死人头骨，用火炙之，藏于身以求胜者，忍心至此，罪不容诛。^[22]

在这篇告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花会赌中的一些女赌客为了赢钱竟“夜赴社庙呼号妖鬼”，更有甚者“开棺取死人头骨，用火炙之，藏于身以求胜者”。她们采取这些祈求神灵鬼怪，甚至开棺取尸、用火烧烤的行为以求得赌博取胜，可谓荒唐至极。由此可见，花会赌博让人神魂颠倒、铤而走险，为害甚重。

由于赌博本身的危害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社会纠纷。晚清曾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就曾审理一桩关于妇女参与花会赌博的案件。官府审理赌博的史料并不多见，所以此则史料极为珍贵。时任县令的汤肇熙在地方治理中感觉到“四民各有居业，而废时失务，丧身败家，惟赌害人实非浅鲜。”可见汤令的施政理念中是严禁赌博的。然而，自他任职平阳县令后就“闻乡间时有私行聚赌，甚至妇女亦为效尤，败俗伤风，殊堪痛恨。”甚至亲自审理了一桩妇女赌博案。材料显示“乃前月沙坑庄有王鲁氏、王范氏互控一案。该族耆老禀称该处百余年来向无赌风，近因有素不安分之人，引诱良善多被其害。”控告双方分别是沙坑庄的王鲁氏、王范氏二位妇女，但是从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鲁氏、王范氏因参与赌博，以致违反农时，失去本业，最后落得丧身家破。这个案件在汤肇熙的细心审理下最终完结，然而令汤肇熙感慨的是妇女参赌，“败俗伤风，殊堪痛恨”。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数月后汤县令因公事下乡视察，竟然遇到了之前案件中的王范氏当街拦截县令的官轿喊冤求助，其事竟和数月前汤肇熙曾审理的妇女赌博案有关，案件的具体审理状况由于记载不详，我们无法得知。由此可以得知，妇女参与赌博所造成恶劣影响的时间之久，危害之深，以致造成其子被人捆绑，性命堪忧的窘境。另花会之外，温州盛行的赌博形式还有“彩票”或者称为“白鹤彩票”等等。

总之晚清以降温州社会风气逐渐发生变化，人心浇薄、俗风渐漓。作为陋习的赌博乘虚而起，花会尤盛就是如此。严重的赌博恶习不可避免地引起社会纠纷和社会混乱，社会犯罪屡有发生。以致当时的府县官员和开明宗族士绅对此非常苦恼，上至国家、下至民间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严禁赌风陋习，展现出了地方官、绅、民之间处理地方事务、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良好互动关系的图景。

三、官绅的禁赌措施

（一）国家颁布法令禁赌

鉴于赌博危害性之大，为了打击和根除这种恶习，减少因此引起的社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健康发展，清朝最高统治者自顺治皇帝始，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屡屡严申禁赌法令和条例，完善对赌博的惩罚立法，从重打击赌博犯罪行为，这些法律措施到了晚清仍然有效使用。

关于惩戒赌博的立法，《大清律例》卷三十四中专门列有“赌博”一条，详细记载了赌博立法问题，且呈不断严厉的趋势。《大清律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所]摊[在]场[之]财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虽不与赌列，亦]同罪，[坊亦入官]。止据见发为坐，职官加一等。若赌饮食者勿论。”^[23]

同时，与历朝相比，清朝统治者以“例”的形式更加完备了严惩赌博的立法。不仅对赌徒惩罚和打击力度加大，“凡赌博，不分军民，俱枷号两个月，杖一百。偶然会聚，开场窝赌，及存留之人抽头无多者，各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官员有犯，革职枷责，不准折赎。奴仆犯者，家主系官，交与该部；系平人，责十板。”同时对旗人参与赌博一视同仁，也照例治罪，“凡旗人将自己银钱开场诱引赌博，经旬累月，聚集无赖放头抽头者，初犯，发极边、烟瘴充军；再犯拟绞监候。”

同时，私造贩卖赌具、开场窝赌者，也都实行最为严厉的惩治。如对造、贩卖和藏匿赌具者的治罪，自康熙三十年至道光五年（1691—1825年），经过五朝不断修改，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而具体的定例，“凡民人造卖纸牌、骰子，为首者发边远充军；为从，及贩卖为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为从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如藏匿造赌器具，不行销毁者，照贩卖为从例治罪。地方保甲知造卖之人，不首报者，杖一百。”而且对官员稽查不严，也将治罪，其例规定“八旗直省拿获赌博，务必穷究牌骰之所由来，如不能究出，或被各处查出，将承审官交部议处。”可见，清王朝对赌博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采取了律例结合、以例为主的立法打击措施，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历代王朝对赌博行为所采取的最为严厉的处罚立法。

毫无疑问，清朝最高统治者关于赌博犯罪的立法详尽而周密，其例的规定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致清中前期国家安定昌盛，民风尚儒，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对此，法史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因此，本文不再赘述。本文关注的问题在

于，晚清赌博立法究竟是怎样执行和实施的？它在民间实施的效果又是如何？

（二）地方官府厉行禁赌

俗语有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区环境与背景各有差异。因此，国家法律和条例在民间的执行与实施，常常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本文中我们仅以温州府为例对晚清时期民间禁赌实况作一个全面系统地考察。

“官府出示严禁赌博”是晚清温州较为普遍的做法。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碑刻资料统计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地均有发现自道光至光绪年间的数通禁赌碑刻铭文。如永嘉县现存共6通“禁赌碑刻”，乐清现存2通，瑞安现存2通，平阳县现存3通，从这些碑文里我们隐约看出赌博常常和偷盗相关联，严重影响正常社会秩序，以致“个个痛恨，家家切齿”^[24]。可以说，赌盗相连严重侵犯了官府的底线，官府必然给予严厉打击。不仅现存碑文中有关于赌博的记录，官员的文集同样存在。光绪八年时任平阳县令的汤肇熙在任期间，鉴于城内赌博之风严重，曾主动发布告示，明令禁赌，其中《禁城内聚赌示》^[25]就是他亲自考察后发布的一篇，现将全文录入如下：

禁城内聚赌示

为再严示禁事，照得赌博为害地方，业经本县严禁并谕飭地保随时指禀，以凭拘究，乃有等棍徒愍不畏法，风闻城内常有聚赌数处，勾结衙役，贿通地保，陷害乡民，乡民来城一入其局，必罄所携带钱物甚至流为偷窃匪。本县于前日晚，亲至南门谯楼庙，拿卢明水、汤阿高二名，重责枷示。除供出开赌之陈大孙黄阿荆等即已签差勒拿外，合再剴切示禁。为此示仰军民各色人等知悉。尔等听人引诱，以赌为事不顾身家，不知利害，以本城近地，尚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其玩视禁令，怙恶不悛，实堪痛恨。本县常时接见衿耆，留心访察，即各乡远近不难一周知，若咫尺之间耳目岂能瞒过。嗣后如再有成群聚赌，匿藏社庙等处，一经获案定即照例严办。如系居民店户并将房屋封闭入官，地保徇隐不报，讯实有无得规分别科罪。本县为民除患，言出法随，各宜懍遵毋自贻悔！切切特示。

从这篇告示中可知，汤氏为了打击赌博，曾亲临赌博场所进行查访，捉拿带头参与赌博之人，予以严惩。同时，汤氏心里明白，赌博活动之所以猖獗，是因为赌头们勾结官府衙役、贿赂。面对如此情景，汤氏做出了时常接见乡贤耆老，和他们互相沟通的举动。同时，对地保进行严厉申斥，以达到“言出法随”的效果。这样汤氏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赌博情况，打击赌博活动，为民除害。可以说，汤氏不是一位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主政者，他以这种告示的形式，阐明赌博危害，严申禁赌法令，成为晚清温州也是其他地区地方官府贯彻封建国家禁赌法令的最普遍的方式。

汤肇熙的行为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古代的官府是一个集军政、司法于一体的组织机构，故而官府所承担的任务是复杂繁重的，它对事务的处理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效率，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面对如此情形，官府就需要借助非官方人士及组织协助其处理辖区内的事务，以求达到治理的最优化，于是，民间组织、宗族士绅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民间自治体，同时，他们也借以维护自身的安全。

（三）地方宗族士绅禁赌

鉴于官府自身有限的力量，宗族、士绅自觉承担起了民间教化和自治地责任，它们在稳定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弥补了官府施政与治理的不足。明代中期至清代温州聚族而居是普遍的事情，统治者一直大力倡建宗族乡约和保甲组织，晚清时期依然如此。正是如此情形，它们在禁赌方面也发挥了官府所难以达到的效果。

鸦片战争尤其是温州开埠以来，清朝统治者加大了打击赌博的力度，温州府县两级官员纷纷将此事知会各地宗族组织以及保甲会社，各地宗族纷纷响应政府号召竖立“禁赌碑”，劝诫赌博。我们在平阳县赤溪镇塘头村发现了竖立于桥边的“禁赌

碑”。该《禁赌碑》于同治五年竖立，具有明显的乡约性质，碑额楷书“永禁赌博”四字。不仅如此，温州的许多民间宗族绅民还积极主动联合具文，请求官府颁发禁赌告示，以增强打击赌博活动的权威性和震慑力。如同治八年出任永嘉知县的王彬针对赌博现状“出示严禁”，并专门下发“奉宪严禁”的告示并刻碑。此碑碑身石制，八字额刻“奉宪严禁”楷书4字，高120厘米，宽62厘米，厚8厘米；正文9行，满行24字，楷书阴刻，碑文清晰，极为珍贵。^[26]

碑文中写道，永嘉县二十三都原本“僻处山溪，素安农朴”，然而最近有不肖棍徒设立“花会”，以致赌博横行，为害乡里。进入赌博之人轻则输光钱财，轻则“荡产破家，负债累累”，重则“沦为盗贼，甚至自尽身亡”。鉴于这种情况，林姓和周姓两个家族共23人由周氏生员周显谟领衔呈请县府勒石立碑，决心联合拒赌。碑文所言“自示之后，尔等务须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安分守法，共作良民，勿再设立花会，开庄聚赌，自犯刑章。倘敢不遵，一经靠发，定即严拿到县，从重究办，绝不宽贷。各宜凛遵勿违！”这通碑文最为明显地展示了地方宗族士绅在禁赌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地方宗族士绅颁布的禁赌碑中，最具典型的当属瑞安县李林乡李山村的“禁赌碑”，该碑刻于清光绪乙酉年（1885年）。查阅史料，我们得知李山村当年发生过一场因赌博引发的动乱，其影响极其恶劣。19世纪初，李山村住有20多户胡姓人家，家家务农，安守本分，由于他们勤劳朴实，每家每户逐渐富裕起来，并且雇佣起了帮工。逐渐，村里有几户人家脱离了生产，不务正业，以赌为生。188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该户人家伙同外地村来的工人聚众赌博。壶垟窟来打短工的陈阿友也参加了赌博并且输了很多钱。由于无法还债，就以外出借钱为由，深夜逃出，在大垟门的树林里上吊自尽。赌徒中有人认为有机可乘，急速赶往阿友家中，捏造事实，虚报情况，说阿友被李山主人家谋害而死。该主人家是富裕人家，可索赔数千银元。阿友的父母兄弟，不问青红皂白，纠集亲戚邻里数百人扬言围攻李山村。李山村见此情景一方面组织自卫，同时呈报瑞安县，请求调解。双方对峙长达三年之久，其中还发生了交火，最后经瑞安县府调解而结束。经此一事，李山村认识到赌博的深刻危害，于是决定各房族推选一名有威望的长辈，成立禁赌组织，订立禁赌条约，互相监督，共同遵守，违者严惩，报信的有奖。并请石匠刻了一块禁赌石碑，上面镌刻着“永禁地方不许开赌放赌”十个字立于村口大路旁。这就是“李山风波”。毫无疑问温州的宗族士绅已经深刻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他们都积极执行国家禁赌法令，维护社会秩序。

不仅如此，许多家族在家训家规中明确禁止赌博，我们简单地查阅一下现存的地方志和家谱资料，发现里面也记载有宗族禁止赌博的家训格言。比如《项瓯东乔项氏家训》有“不许围棋、双陆、赌博，围棋双陆不如担粪牧猪，虽年长者不许游手^[27]”的记载。《张沧江纯普门张氏族约》中有记载劝诫赌博的诗句二首：

卖田卖地只因贫，产去何堪税尚存。富者忍为贫者害，有何方寸与儿孙。

又曰：

末作游民懒不耕，何尝衣食得丰盈。赌钱输了终为盗，饮酒多时便起争。

“家训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与训导之言，出自家庭中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教导子女立身做人的需要^[29]。”从这两则家训中我们就能清楚看到项张两组家训所具有的训导色彩，所传达出的浓厚的道德教化氛围。其中，我们走访温州，也收集到一首关于戒赌的歌谣：

莫赌博，莫赌博，赌博之人无流落……万般皆出耕读中，富贵未闻有赌博！

可以说，道德教化这些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劝人向善的方式，也反映出对于赌博的行为，除了国家法令严厉打击、地方官府颁布禁令、宗族士绅带头示范之外，温州的宗族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劝诫作用，内外兼治、重本清源，以期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因此，道德教化也是禁赌不可或缺的方式。

正是这种地方官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才使得晚清温州的民间禁赌在内忧外患、纷繁复杂的情形下得以有力地实施。

四、效果不佳的晚清禁赌

数千年的儒家文明浸染的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似乎也变得有些迟钝了。就赌博而言，温州的官绅百姓都十分清楚它的危害，屡次禁赌效果甚微。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赌博具有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拥有广阔的市场，加之赌场人员的引诱哄骗，平民百姓一旦染上赌博就深陷其中，难以自拔。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临时政府大力移风易俗、改良人心。相继颁布一系列禁赌法令，规定“凡人民宴会，邀饮各场所，一律禁赌，并销毁各种赌具，倘有违者，一律按现行律严办。”^[30]然而民国时期赌风依然如炽。著名的瑞安士绅张桐在其日记中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一日发生的花会赌博，“近来大典下赌徒余子英倡做花会，各城乡男女被其诱惑，而后里亦有人收花会影。”^[31]在这次花会赌博中居然有人中奖赢钱。但张桐确认为“然此种侥幸不能常遇，恐若辈贪心不戢，笔致终被迷惑也”^[32]。除了百姓被引诱外，官府居然也公然赌博，自身明令禁赌自身却知法犯法，败坏社会风气。同年六月十八日，张桐记录瑞安警官邵某严厉禁赌，结果自己却在李委员家参与赌博恰巧被孙氏孙莘农撞见，十分惊讶，遂言“捉赌者乃亦自犯赌耶？”

可以说，晚清禁赌虽采取了多种措施，然效果并不明显，整体的社会风气依然没有改变，社会动荡不堪，人心四面浮动，奸邪之人乘机而动严重影响了禁赌的效力，以致民国赌风偶然好转、整体依然败坏，给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破坏，造成了十分不好的影响，阻碍了社会的正常发展。

五、余论

关于晚清温州的赌风之烈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上至皇帝宰执、下至温州地方官府和宗族乡绅都十分清楚。他们更是对赌博行为深恶痛绝，为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严禁赌博。我们看到面对国家从立法的角度进行打击的措施，温州的官府和宗族士绅相互联动对赌博进行控制，并收到了一定效果。毫无疑问，晚清时期温州的禁赌就是民间乡里内生的社会组织与地方官府面对地方社会基本秩序的一种互相整合，互相协调。“州县官需要士绅的合作与支持，否则其行政不可能顺利进行。”^[33]正是因为“他们与家乡的关联是永久性的，从而造就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归附；士绅们似乎都感到他们有责任捍卫和促进本地区福利”^[34]，加之士绅与本地百姓即宗族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使得官、绅、民三种群体在面对这种如毒瘤一般的恶风陋习时，自然想到要根除恶习则必然是采取综合措施进行治理，这就显现出传统中国社会大多采取是一种官府治理与士绅以及民间自治想互动的治理模式，这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1][3][4][6][7][13] 輶轺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1、11、11、12页。

[2] 嘉靖《温州府志》卷一，明嘉靖刻本，第10页。

[5] 金柏东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一五一《重修永嘉县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8] 潘猛补编：《温州历代诗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6页。

[9] 乾隆《温州府志》重辑序，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

[10] 光绪《永嘉县志》永嘉县志卷之六，清光绪八年刻本。

-
- [11]乾隆《温州府志》卷之十四，清乾隆二十五年刊民国三年补刻本。
- [12]郭钟岳：《瓯江小记》，转见《东瓯逸事汇录》卷二风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 [14]汤肇熙：《出山草谱》，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温州市图书馆藏。
- [15]汤肇熙：《出山草谱》之《禁沙坑庄聚赌示》，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温州市图书馆藏。
- [16]《清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刑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18]徐珂：《清稗类钞》卷十，中华书局 1984 版，第 4878、4911 页。
- [19]韩文绮《韩大中丞奏议》卷九《复奏查办会匪疏》，清道光刻本。
- [20]屠诗聘：《上海市大观呼卢喝雉》，中国图书编译馆 1948 年版，第 46 页。
- [21]汤肇熙：《出山草谱》之《开列条规示》，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藏。
- [22]汤肇熙：《出山草谱》之《臚欺禁除恶习示》，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温州市图书馆藏。
- [23]《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 [24]杨思好主编：《苍南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
- [25]汤肇熙：《出山草谱》卷三，清光绪昆阳县署刻本，温州市图书馆藏。
- [26]黄舟松、林伟昭：《瓯海金石志》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9 页。
- [27][28]光绪《永嘉县志》卷之六，清光绪八年刻本。
- [29]王有英：《清前期教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0 页。
- [30]李克主编：《赌博犯罪纪实》，中国致公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2 页。
- [31][32]张桐：《张桐日记》，俞雄选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8、464 页。
- [33][34]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7、276 页。